

《论语》英译与西方汉学的当代发展*

王琰 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

摘要: 受当代西方汉学研究趋势的影响, 当代《论语》英译主要出现在90年代之后, 其翻译方法和特点也与之前的译本有一定的区别, 大致可归为两种诠释定向: 面向理论和现实的定向与面向文本和历史的定向。当代《论语》英译具有鲜明的创新性, 其多元化的形态不仅丰富了汉学本身, 还促成了汉学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的交叉, 增加了汉学研究对于西方的现代意义, 促进了西方汉学与中国学界的对话和交流。

关键词: 《论语》; 英译; 西方汉学; 诠释定向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873X(2010)03-0024-09

二战后至今在西方出版的《论语》英译本共10部, 除刘殿爵(D.C.Lau)的企鹅版译本外, 其余9部都是在90年代之后出版, 这与战后西方汉学发展的阶段性特点有关, 而翻译的方法 and 特点也受到该时期汉学研究趋势的影响。鉴于二战后西方汉学分支增多, 而《论语》英译属于儒家思想研究支系, 因此下面以西方儒家思想研究的发展脉络分析为主。另外, 由于美国在战后西方汉学中占主导地位, 最具有代表性, 下面分析将以美国汉学为主。

1. 美国汉学的发展与《论语》英译趋势

美国汉学从战后至今的发展经历了多次变化, 有一些学者甚至以10年为一个周期分析其历程^①。这里根据本研究的特点, 就其整体研究趋向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初期的外向型汉学研究阶段和后期的内向型研究阶段。

1.1 初期的外向型汉学研究 with 《论语》英译的空白

美国汉学在战后由遵从欧洲传统走向独立, 并迅速跃居西方汉学中心地位, 这与它对中国的认识和态度变化有关。由于在二战中亚太地区的重要性突显, 战后美国对远东局势颇为关注, 开始重视这一区域的研究, 尤其是对中国的研究, 而冷战战略的形成使得中国研究具有更加紧迫的现实意义。过去以古典研究为主的汉学已经不能满足这种现实需求, “区域研究”应运而生, 其倡导者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将其定义为“一种跨学科研究, 具体来说就是运用各种社会科学方法, 集中对某一特定地区进行研究”(Fairbank, 1982: 324), 就中国研究而言, “是以近现代中国为基本研究对象, 以历史学为主体的跨学科研究的学问”(安藤彦太郎, 1982: 26)。这种研究取向促使美国汉学由重心在语言、文学等领域的纯学术研究向侧重现实问题的实用性研究转变, 打破了以往汉学“重视传

统、轻视现实”, “重视实证、轻视理论”的学术传统(侯且岸, 1995: 7-10)。为了体现这种区别, 学科名称也发生了变化, “汉学在传统上以文献研究和古典研究为中心, 所以在研究历史较短的美国似乎感到 Sinology 一词有点过时的味道, 一般称之为 Chinese Studies”。(福井文雅, 1992: 221)

战后初期的美国汉学研究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偏重对近现代中国的研究, 体现了其着眼于现实的特点, 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专著于清史研究的费正清。费正清倡导中国研究要成为与现实相关的科学, 并强调研究当代中国一定要研究中国现代史, 而研究中国现代史一定要研究清史(杜维明, 2001: 9)。另一个特点就是研究倾向于结合政治、经济、社会因素, 将历史研究与现实政治、经济有机联系起来, 在方法上大量借用社会科学的理论。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美国先后出现的几种主要研究模式都是运用现代化理论框架来阐释中国近现代史, 其中包括“冲击—回应”、“传统—现代”和“帝国主义论”模式。(陈君静, 2003: 143)

这种研究趋势也影响了当时美国对儒家思想的研究, 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变化, 一是美国学者倾向于分析儒家传统与现代状态和现代化之间的关系, 二是侧重在历史和社会背景中研究儒家思想, 注重其“历史性”。黄俊杰将这种研究取向称为“外在的研究途径”, 即“将思想内容置于历史脉络中分析”(2008b: 275), “强调在政经社会背景与脉络中研究儒家思想”(同上, 284)。在这种趋向近现代现实研究的潮流中, 儒家思想的内涵研究不再占据主导, 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曾对战后美国汉学界的这个特点做过以下描述:

美国的学术界一般强调社会、政治史, 即使对人类文化有兴趣, 也是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出发。他们研究思想史, 不是强调它的内涵, 而是将思想活动本身当作是一社会历史现象, 所以思想总是

被当作社会力量或心理结构的发射,而思想内涵本身则并无意义^②。

因此,汉学界对儒家典籍文本内部的研究不再有之前那样的投入,而多是将以前的标准译本(如理雅各、韦利译本)作为资料用于分析、研究。此外,当时中国国内对儒家思想的批判也在美国汉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这两方面原因造成了儒家典籍研究几乎空白的局面,《论语》在该时期也没有新译本出产。

1.2 后期的内向型汉学研究 与《论语》英译的繁荣

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是美国汉学发生转折的标志性时代,战后中国研究的“现代化”理论模式受到了批判,出现了“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的史学动向。这种转变源于该时期发生的越南战争、水门事件等对人们思想的冲击,部分学者开始对西方文明进行反思,并对西方史学的“西方中心主义”提出质疑。在汉学界,学者们开始反对以费正清为代表的西方中心论研究模式,倡导“中国中心观”,即“以中国为出发点,深入精密地探索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与形态结构,并力主进行多学科性协作研究”(林同奇,2002:5)。柯文(Paul A. Cohen)的专著《在中国发现历史》(*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1984)^③是这一取向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他提出“内部取向”(internal approach)的研究角度和“移情方法”(empathy method),主张“‘卸下’那张紧紧地裹着史家自身的文化的、历史的乃至个人的‘皮’,然后钻进他所研究的对象的‘皮’中去”。(同上,22)

这种反省和转变在儒家思想研究中也体现,最有代表性的是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和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狄百瑞反对费正清等人将儒家思想视为桎梏中国人思想、阻碍中国现代化根源的观点,坚持认为其内部具有革新的力量,并预测“中国人民的新经验最后将被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内部涌现出来的事物,而不仅仅是由外部激发的革命”(De Bary, 1975:32),并专注于儒家思想本身的研究。墨子刻在其专著《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Escape from Predicament: Neo-Confucianism and China's Evolving Political Culture*, 1977)中批判了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诠释,并将儒家思想本身视为中国近代走向现代化的主要原因。随着研究的深化,许多学者也逐渐认识到,中国近现代思想和近代以前的思想是分不开的,想要绕过传统是不可能真正了解近现代的,由此美国汉学界从反省两极化模式转移到对中国思想本身的研究上来,开始注重儒家思想内涵和概念的分析,转入到“内在的研究进路”(黄俊杰,2008b:290)。赫伯特·芬格莱特(Herbert Fingarette)在其孔子研究著作《孔子:即凡而圣》(*Confucius—the Secular as Sacred*, 1972)就试图

从《论语》文本本身出发,“用孔子自身的话语来揭示或阐明他的思想”(Fingarette, 1972: x),体现了“内部取向”的诠释和研究角度。他强调“礼”在孔子思想中的核心地位,并展现了“礼”的现代价值,突出了《论语》的哲学意义。狄百瑞等人的研究也有相似的趋向,他在80年代后的研究中突出儒学传统中的自由主义,90年代又提出儒家可以为现代的人权观念提供新的资源。此外,上世纪80年代海外新儒家的兴起参与并助长了这种挖掘儒家思想现代价值的研究趋向。

在这种趋势中,儒家思想内在的宗教性、哲学性逐渐成为美国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并形成了比较哲学和比较宗教学的进路。郝大维(David Hall)和安乐哲(Roger T. Ames)是采取比较哲学进路的代表,他们意识到了自身哲学传统的不足,试图重新诠释并引进儒家哲学,其合作编写的一系列专著体现了这种取向:《通过孔子而思》(*Thinking through Confucius*, 1987)^④、《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Thinking from the Han: Self, Truth and Transcendence*)^⑤、《期望中国:中西哲学文化比较》(*Anticipating China: Thinking Through the Narrative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⑥。而安乐哲和罗思文(Henry Rosemont, Jr.)合作翻译的儒学经典也是这种研究进路的成果,如《论语》译本*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A 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1998)。以南乐山(Robert Neville,)和白诗朗(John Berthrong)为代表的“波士顿儒家”(Boston Confucians)则是用比较宗教学的思路来研究儒家思想,代表性的专著有南乐山的《道与魔》(*Tao and Daimon*, 1982),杨意龙(John D. Young)的《儒教与基督教:初次相遇》(*Confucianism and Christianity: the First Encounter*, 1983),白诗朗的《普天之下:儒耶对话中的典范转化》(*All Under Heaven: Transforming Paradigms in Confucian-Christian Dialogue*, 1994)等。

需要注意的是,比较哲学和宗教学研究进路的出现并未取代以往的史学研究进路,思想史研究仍然占据着比较重要的地位,冯耀明(2008:260)就认为北美儒学研究的主流是思想史研究,其次才是比较宗教和比较哲学研究。不过,近年来思想史方面的研究与战后初期外在研究进路的历史性研究又有所不同。研究范围的拓宽和方法的改进使得学者对以往简化的倾向有所反思,倾向于将思想的发展解释为不同思想学派对话和批评的结果,试图勾勒出“更完整、更详细和更贯通”的描述(方克涛,2008:170-171),如葛瑞汉(A.C.Graham)的《论道者》(*Disputers of the Tao*, 1989)和陈汉生(Chad Hansen)的《中国思想的道家理论》(*A Daoist Theory of Chinese Thought*, 1992)。这种研究思路也影响了汉学家们对于典籍的认识,越来越多学者认为先秦诸子的著作可能是不同时代的不同作者编纂而成,其

内容、结构甚至哲学观点并不一定统一,而且一些学者已经开始了在该方向上的研究,白牧之(E. Bruce Brooks)和白妙之(A. Taeko Brooks)夫妇的“战国研究小组”(WSWG, Warring States Working Group) 研究计划就是最典型的代表,而其《论语》译本 *The Original Analects* (1998) 是该研究成果之一。

以上提到的哲学性和史学性的研究进路都对儒家思想本身比较重视,这种内向的研究进路引起了学者们对儒家经典的重新研究和诠释,《论语》作为儒家的核心经典也受到了普遍关注,新译本陆续有 10 部出版,以上提到的郝大维、安乐哲的合译本以及白氏的合译本就代表了这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下面将重点分析。

2. 《论语》英译的两种诠释定向

二战后《论语》英译本数量较多,但集中于 20 世纪 90 年代出现,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近年来西方汉学界的儒学研究趋于对儒家思想内涵的探讨,很多问题都需要回溯到原典,原典的研究和诠释重要性突显;第二,东亚儒学文化圈的崛起在西方引发了儒学热,更多学者参与到其中,大众也有了解的需求;第三,后现代思潮在上世纪 90 年代形成了全球性的影响,在经典诠释上表现为追求解读的多元性;第四,随着考古成果不断涌现以及对中国语言、文化研究的深入,西方学者对《论语》的研究和认识也有了新的发展,催生了新译本的出现。该阶段出现的译本按时间顺序排列如下:刘殿爵的 *Confucius: The Analects* (1979, 1983, 1992)^①, 托马斯·克里利(Thomas Cleary)的 *The Essential Confucius* (1992), 雷蒙·道森(Raymond Dawson)的 *Confucius: The Analects*(1993), 黄继中(Chichung Huang)的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1997), 西蒙·利斯(Simon Leys)的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1997), 大卫·亨顿(David Hinton)的 *Confucius: The Analects*(1998), 安乐哲和罗思文的合译本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A 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 (1998), 白氏夫妇的合译本 *The Original Analects* (1998), 爱德华·斯林哲兰德(Edward Slingerland)的 *Confucius: Analects, with Selections from Traditional Commentaries* (2003) 以及华兹生(Burton Watson)的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2007)。

和以往的译本相比,本阶段大部分译本有个共同的新特点:有意识地避免西方文化前见对诠释的影响,尽量回归儒家特有的思想,这与该阶段西方汉学“中国中心观”的趋向有关。不过,译本具体采取的诠释方法却各有不同,译者身份、翻译目的以及对文本认识的差异是形成这种不同的原因。首先,译者们对《论语》文本有不同的看法,如利斯将之视为文学作品,安乐哲和罗思文将其作为哲学文本,白氏夫妇则将其作为特定历史中

的产物。其次,该阶段译者除了共同的汉学家身份外,还有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等不同身份,因此在诠释时侧重点不同,如哲学家着眼于观念预设和陈述模式,而史学家更注重文本的起源以及与社会、政治等的联系。第三,翻译目的各异,利斯试图将孔子思想的现代价值传达给普通大众,安乐哲和罗思文力图在英语中将孔子思想的哲学特点体现出来,而白氏夫妇则是为了探究战国时期文本的真实历史面貌。虽然译本呈现出如此多元的形态,但采取的诠释进路大体上可以归为两种:面向文本与历史的定向和面向理论和现实的定向。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一部作品的诠释过程往往同时包含这两种定向,刘笑敢就提出诠释作品是“两种定向之间冲突、融合与妥协的结果,是内在的两种定向外化凝固的结果”(2007: 98),以上划分的根据是视其更侧重于哪一个方向而言的。

2.1 面向理论和现实的译本

安乐哲、罗思文的译本和利斯的译本属于面向当下和现实的诠释定向,这种诠释着眼于经典中超越时空情境的那部分特质,强调对于当下乃至未来的意义。不过,这种诠释并不否认经典产生于某种历史情境中,也需要运用训诂等传统汉学方法来获得文本的意义,但与另外一种定向不同之处在于诠释者并不满足于文本意义理解,其最终目的是要挖掘出经典富含真理性的一面,以期为现实问题给出指导,回应当下的困惑和需要。

2.1.1 安乐哲、罗思文译本——面向理论的诠释定向

安乐哲和罗思文译本是这种诠释进路最典型的代表。译者将《论语》视为与西方哲学思维方式不同的哲学文本,且蕴含着现代价值,他们翻译《论语》的目的是为了提供一种和西方哲学不同的思维方式,从而丰富和改造西方的文化资源,以便更好地认识自身和世界。

其译本名为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A 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 这里“哲学性翻译”指的是用哲学的方式来研究、诠释和翻译《论语》,而非仅仅翻译文本所蕴含的哲学观念。这种研究要满足以下条件:“解释这些观念的预设、阐明观念的意义、细察支持它们的证据,鉴定其真理性”(Lin, Rosemont & Ames, 1995: 747)。在《论语》的翻译中,他们“哲学的方式”具体表现为建构《论语》的哲学语境,在该语境中进行文本的诠释和翻译。在《论语》译本的序言中,安乐哲和罗思文给出了中国哲学思想的预设,建立起了孔子“情境化艺术”的哲学语境,然后在该哲学语境中诠释文本。因此该翻译并不是传统的从文本诠释到翻译的线性过程,而是先从文本出发构建出理论体系,再返回文本结合已构建的体系进行诠释、翻译,在这个过程中包括了理论的建构。

译者在把原文放回“情境化艺术”的哲学语

境中诠释后,下一步便是在英语中选择相应的词语来体现他们的诠释。不过,因为“现在的汉英词典蕴涵着一种与它们所要翻译的文化格格不入的世界观”,“本身就渲染着严重文化偏见的油彩”(安乐哲,2002:116),所以,译者并没有借助标准词典完成这步而是在对英、汉语言哲学特点分析的基础上进行了带有创新性的异化翻译,以反映具有中国哲学特点的孔子思想,反映他们“对中国古代思想事件的、动态的和关联的诠释”(Ames & Rosemont, 1998: 279)。具体的策略有创造新词和音译,此外也充分利用英语中现有的语言资源,这是为了体现《论语》异于西方的哲学表述方式,建构起新的表达孔子哲学的话语体系。

和以往的《论语》翻译相比,他们的诠释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不仅仅是一种认知性的纯学术活动,而且还包括了创造性的哲学建构,既是在西方学术语境中对中国哲学的重构,也是对西方哲学的重新认识和建构。其目的不仅仅限于为读者提供《论语》的文本意义,而是要呈现孔子思维的方法,特别是孔子不同于西方的哲学观念,从而打破西方哲学中二元论的统治地位,提供看待世界的多元视角。

2.1.2 利斯译本——面向现实的诠释定向

利斯译本更偏重《论语》对于现实的意义,他认为《论语》可以视为“现代书籍”(Leys, 1997: xxi),孔子思想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遍意义,“能穿越2500年而直接指向我们现代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同上: xvii)。译者以一种现代眼光来看待《论语》,在他看来,经典有一种永恒性,但需要通过新的诠释和发展在现代获得生命(同上: xvii-xviii)。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利斯在翻译中倾向于用现代的理念来诠释《论语》,如:

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In the affairs of the world, a gentleman has no partis; he takes the side of justice. (Leys, 1997: 16)

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以夺志也。

One may rob an army of its commander-in-chief; one cannot deprive the humblest man of his free will. (ibid: 42)

以上两句的翻译都增加了一些现代色彩,第一句似乎表达了在当今世界维护正义的使命感,而第二句中“志”译为“free will”,这是中国古代文化所没有的概念。这样的翻译是以现代观念来重新诠释经典,着眼于对当下、现实一些问题的思考,确实更富有现代意义和普遍意义,但不免消除了孔子思想本有的文化特质,属于个人创造性的诠释。

利斯译文较之其他译本更注重文字的优美,在前言中他提到自己是以作家的身份来翻译《论语》的。利斯是法国的汉学家,真名为 Pierre Ryckmans, 英文名是其笔名,他早在1987年便用法文翻译了《论语》*Les Entretiens de Confucius*,而英译本主要提供给现代大众读者,这也就是其诠释方法和翻译风格的原因所在。

释方法和翻译风格的原因所在。

2.2 面向文本与历史的译本

采取面向文本与历史诠释进路的译本强调经典是特定时空情境的产物,译者力图求得文本编纂者本来的意图,认为这是正确诠释文本的不二法门。除了安乐哲、罗思文合译本和利斯译本外,上述译本都属于该类型,不过具体采取的诠释方法有所不同。

2.2.1 历史诠释

白牧之、白妙子夫妇的译本属于对典籍的历史诠释,他们将《论语》视为具体历史条件的产物,且是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由不同作者编纂的一系列合成文本,主题前后不一。在诠释时他们试图回归到《论语》成书时的情境中,联系当时的社会背景对文本进行诠释,以求得文本生成的原貌,这也就是译本之所以命名为 *The Original Analects* 的原因。

这种历史诠释进路在中西方的经典诠释中都有学者采用,周光庆将其定义为“多方搜集材料,深入考察历史,努力重建创作文化典籍的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以及创作者处于这一环境中的特有文化心态,从而为设身处地地进行心理解释创造必要的条件。”(2002: 304)可见,这种诠释思路是将典籍视为特定时空背景的产物,并以成书的历史语境作为最可靠的解读依据。而由于《论语》并非一时一地一人所著,因此其成书过程成为该诠释进路的研究重点之一。白氏将《论语》视为先秦数代儒家在特定的社会、思想背景中回应时代需要而编著的一系列文本的汇集,提出了《论语》成书的“层累理论”(accretion theory),即只有第四篇为最原始孔子言行的纪录,其余都是其弟子和后代子嗣在其死后两百余年间编纂累积而成。在具体诠释中他们奉行“以史释经”的诠释方法,先结合历史、语言,运用考证、辨伪的方法确定文本的作者和年代,重构《论语》成书的历史语境,再将文本以篇为单位放回其重建的历史语境中进行诠释,并加有背景描述、引导性注释和总结。在表达上,他们采取了字字对译和文外解释相结合的策略,其译文倾向于直译,尽量重现原文的文体、结构特点,通过译文来展现文本语言、结构的前后不一致、臃杂的特点,突出文本的历史层次性。

实际上,白氏的《论语》翻译是以新文化史的思路对经典进行的诠释,侧重揭示知识与权力关系之间的互动,突出了《论语》文本的复杂性、无固定结构性,是对现代理性主义思维的反驳,具有后现代主义的特点。他们的翻译与以往翻译最大的不同在于颠覆了传统的文本观,消解了文本的整体性和思想通贯性,另外在研究方法上也有创新,如运用社会科学的视角和方法以及将事实与虚构相提并论的后现代历史叙述方法。

2.2.2 回归原典的诠释

除了白氏夫妇的译本外,其余译本都可划归为

一种回归原典的诠释方法，重点放在对文本本身意义的诠释上。虽然研究者们也都意识到了《论语》成书于不同年代，但普遍认为文本基本上反映了较为统一、融通的孔子思想，因此将其作为整体来翻译。

这类译者中刘殿爵和黄继中是华裔学者，其《论语》诠释属于较为传统的路子。刘殿爵译本共有三个版本，1979年由企鹅出版社出版，后就附录和注释做了少许改动于1983年由香港中文大学重新出版，1992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了修订后的第二版。这三版译本的风格变化不大，学术性上新版比老版更为严谨，在92版序言中他提到自己翻译方法更为严谨，求“信”为先，求“雅”为次。刘译文所用词汇简单，多为盎格鲁—萨克逊时期词汇，其学生安乐哲认为这类词汇蕴含前拉丁化、前基督化的世界观，可以排除希腊、罗马词汇带来的西方哲学和宗教的前见影响，更准确地体现孔子思想。该译本副文本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包括《论语》思想、孔子生平、其弟子和《论语》文本成书过程的分析。

黄继中最先在国内任教，后到美国担任中文教授，翻译趋向直译，注意保存原有的句法和词序，其中对关键词的解释主要依据《说文解字》和《辞海》。该译本比较特别的一点是对于《论语》中意义有分歧的句子，译者除给出译文外，还在注释中给出了历史上其他注疏者的诠释。

雷蒙·道森译本的诠释方法也较为传统，这与他的欧洲汉学背景有关。道森是英国汉学家，翻译《论语》前已出版了数部汉学著作：《中国遗产》（*The Legacy of China*, 1964），《中国变色龙》（*The Chinese Chameleon: An Analysis of European Conceptio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1967），《中国经验》（*The Chinese Experience*, 1978）和《孔子》（*Confucius*, 1981）年，研究进路属于欧洲传统微观汉学，这也影响到了他对《论语》的诠释。虽然他承认《论语》成书于不同年代，文本也表现出一定的杂合性，不可能找出一套融通的哲学思想来（1993: xv），但他强调重要的是《论语》代表了典型的中国思想（同上: xiii）。他对关键词的翻译可以体现出其保守的倾向，如将“仁”译为“humaneness”，“义”译为“rightness”，而不做太多的创新。在表达上，他不赞成为了符合译入语习惯而牺牲准确，但也反对过于强调贴近原文。在他看来，翻译这样的文本主要是为普通读者提供明白、畅销的译本，以真正达到跨文化交流的目标。但鉴于西方译者不免会受到西方宗教和哲学前见的影响，因此哲学文本的翻译只能是一种“近似”忠实（同上: xxvii）。该译本简洁、明了，又不乏学术严谨性。

大卫·亨顿以另外一种进路来挖掘《论语》所体现的孔子哲学，他强调文本内容的融通性，认为“礼”是孔子哲学的核心。在序言中，他提到孔子

所处的社会正经历由神文化到人文化的转变，因此孔子注重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试图通过重新阐释一些词语来建立自己的哲学思想。如孔子重新定义了“礼”，使其由一种祭祀文化转为人的日常行为规范（1998: xxii），又进而通过“礼”来定义其他关键词，如将“仁”视为是“礼”的践行。译者的这种诠释从他具体的翻译中也可以体现出来，如将“克己复礼为仁”译为“giving oneself over to Ritual”（同上: 127），强调了“礼”的中心地位。在表达上，其译文注重体现原文的口语风格，句子结构短小、词汇简单。

托马斯·克里利的诠释方法较之上面的几位译者更富有创新性，但仍旧是为了突出孔子思想的本来面貌。译者考虑到中国历代注疏思想繁杂，不利于把握《论语》本义，便采用了一种特别的诠释方法：以孔子对《易经》卦象所作的注释为主题，将《论语》原有结构打乱按这些主题重组，再进行具体的翻译和诠释。这样做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考虑到西方读者的接受问题，一方面《易经》在西方广为接受，该方法有助于西方读者理解孔子思想的哲学根源；另一方面主题归类可以解决《论语》文本思想体系性、逻辑性不强的问题，符合西方读者思维习惯（Cleary, 1992:）。这是一种跨文本诠释方法，刘笑敢曾对这种方法做过定义：“以一部作品的内容（观念、概念、命题、理论等）去解释另一部作品”，但是“跨文本诠释所借用的文本和诠释对象之间的差异越大，偏离诠释对象文本的可能性也越大”（2007: 91）。《易经》与《论语》无论从命题、内容还是风格上都有很大差异，而孔子对于《易经》的注释和《论语》中的思想也并不能简单视为一致，这样的诠释非常有可能曲解文本原有的意思。此外，他在翻译上有简化的趋向，削减了《论语》本身丰富的意蕴。可能正是由于这两方面的不足，该译本在汉学界并没有什么影响。

斯林哲兰德（Edward Slingerland）的 *Confucius: Analects, with Selections from Traditional Commentaries* (2003) 则是侧重翻译《论语》的历代注疏，这是《论语》翻译出现的一个新趋向，与近年来西方汉学界注重中国典籍注疏研究的新方向有关。

3. 《论语》英译对西方汉学的价值和意义

当代《论语》英译的成果丰富，尽管它只属于儒学研究的一个分支，但也参与了西方汉学发展成熟的进程，体现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西方汉学发展的一些特点，并对西方汉学界乃至中国哲学界、史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一阶段《论语》英译具有创见性研究的色彩，如安乐哲、罗思文的译本和白氏夫妇的译本，再加上国际文化交流的增多，《论语》英译不仅对西方汉学界尤其是儒学界有一定的影响和贡献，而且对大陆和港台学界也有一些影响和启发。具体来讲，有以

下几个方面:(1) 构成西方儒学的多元化局面;(2) 增加西方汉学研究的现代意义;(3) 促进西方汉学和大陆、港台学界的对话。

3.1 构成西方儒学多元化局面

这一阶段的西方汉学是有史以来成果最为丰富的时期,主要原因是研究范围的扩大和视角的深入,齐头并进的各类研究都在其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西方汉学中的儒学研究分支同样如此,《论语》的英译也为其多元化局面的形成贡献了一份力量。当代西方儒学大概可以分为几个流派:(1) 以陈荣捷和狄百瑞为代表,他们重视儒学内部的哲学性课题研究,并注重基础资料建设和经典翻译,以研究宋明理学为主;(2) 以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等新儒家及波士顿儒学学派为代表,他们以重新诠释儒家学说为途径建构儒学价值信仰,提倡文明之间的对话;(3) 以安乐哲、郝大维为代表,运用比较哲学方法对古典儒学进行建构性的诠释,主要采用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和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分析古典儒学的基本范畴,重建儒学哲学系统;(4) 以倪德卫(David S. Nivison)为核心,主要运用分析哲学研究中国古典哲学,以文献学上的精细分析及哲学上的细密思考见长;(5) 以史学研究为主的一批学者,他们有较强的历史意识,关注儒学史研究中哲学与史学不一致之处,力图从史学立场出发纠偏。

安乐哲、罗思文的译本和白氏译本分属第3类和第5类儒学研究分支,而刘殿爵的译本则大致可划归第1类研究分支,《论语》的翻译整体来讲又属于儒家思想原典研究范围。这些成果丰富了西方儒学,也促进儒学在西方汉学中成为一个研究领域。杜维明就明确指出,如果没有安乐哲、芬格莱特、南乐山的参与,作为一个领域的儒学研究将明显萎缩(杜维明,2006:167)。

3.2 增加西方汉学研究的当代意义

只有当中国富有创造性的生命力不再只是以汉学思维进行研究,中国文明才会有这样的形象:它不只是在历史上曾经是重要的,而是具有历史性的重要意义(*not just historically significant, but historically significant*)。仅仅以“汉学的”形式来欣赏中国文化可能会贬低其价值。因为如果“汉学”只是西方对中国文明好奇的结果,那么中国文明的重要性只能是“微不足道的”。(Levenson, 1964: 512)

以上这段文字是20世纪中叶一位汉学家对汉学的期望,20世纪中叶前的汉学研究大多局限于对古代中国的探知性研究,他们希望汉学可以突破这种仅仅出于好奇的认知性追求,挖掘中国文化蕴含的永恒价值。这种期望在20世纪下半叶尤其是80年代后得以实现,世界范围的反“西方中心论”思潮的兴起是汉学研究发生这种改变的重

要契机。80年代后,西方面对各种社会问题和文化危机开始了对自身的反思,并试图在其他文化中找到解决的答案,中国文化是其重要的资源之一。汉学研究受到这方面思潮的影响,也发生了转变,开始注重挖掘中国文明的现代价值,以期发现对于西方的实践性意义。如狄百瑞在80年代注重儒家自由主义传统的挖掘,在90年代又提出儒家可以为现代的人权观念提供新的资源。杜维明更是致力于儒学的创造性诠释,以展示其内在精神与现代意义,进而和西方文明对话,解决现代西方文明面临的问题。安乐哲、郝大维、罗思文也对中国哲学进行了创造性的诠释,试图在中国哲学中寻找新的思维模式,与西方中心主义抗衡,完成西方文明向世界文明的转换,他们的《论语》翻译正是这种努力之一。

安、罗认为《论语》蕴含着现代价值,是可以丰富和改造西方世界的文化资源,他们以哲学的视角和方法对《论语》进行诠释和翻译,结合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和过程哲学对孔子哲学思想体系进行了重新建构,并采用异化翻译策略体现其独特性,这都是为了在西方语境中树立孔子思想哲学的形象,以期改变西方不承认中国哲学的现状,为西方提供另外一种思维的方式,打破哲学为西方垄断的局面。另外一方面,他们也通过这样的方式丰富了实用主义哲学和过程哲学,正如安乐哲(2006:140)所说的,“这种过程性的诠释又向我们提供了观察我们自己西方感受性的新的透镜”。除了安、罗外,《论语》的另一译者利斯也认为孔子思想蕴含着普遍价值,可以解决现代社会面临的问题,译本结合现实的一些问题以现代社会的观念来赋予《论语》新的诠释,说明其现代意义。

这些《论语》的诠释和波士顿儒学、海外新儒家一起促进了儒学的现代转化,揭示了儒学思想对当代西方社会甚至整个世界的意义所在,增加了宗教和哲学的纬度,从而使得汉学研究突破了纯粹象牙塔式的学术研究状况,具有了现实意义。另外,这些研究也促进了文明间的对话。杜维明将“平等”和“差别”视为文明对话的先决条件,“没有平等,交流就缺乏共同基础;没有差别,那就没有必要交流。”(2006:107)安乐哲等人在翻译《论语》时强调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平等地位,同时又注意它们的相异性,而利用实用主义哲学对其的诠释使得两种文化对话成为可能。波士顿儒学则承认宗教的多元性,认为儒学和基督教一样富有意义,他们采用过程神学促进了儒学和基督教的对话。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们也都参与了当代儒学的重构,使得美国成为大陆、港台地区之后的又一个儒学基地,使得西方儒学获得了与大陆、港台儒学对话的地位和权利。

3.3 促进西方汉学与其他学界的对话

西方汉学在 20 世纪初由法国汉学引领时，曾与中国学术界有着密切的联系，沙畹 (E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伯希和 (Paul Pelliot 1878-1945) 等大家的学术成果也受到中国学者的肯定，甚至在相当程度上左右了国内近代学术发展的趋向 (桑兵, 1999: 139)。此后由于战争因素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国际冷战局势和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西方汉学界除了与港台学术界有一些交流外，与国内学术界基本上处于隔绝的状态，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有所改观。80 年代之前，港台新儒家的一些代表人物如钱穆、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受邀到美国访问或讲学，促进了与西方汉学界的交流。其中，除方东美有一定数量的论文和哲学专著以英语发表外，其余人的学术成果主要通过其弟子杜维明、余英时、刘述先等海外新儒家以及汉学家狄百瑞等人在英文著作中介绍而为西方汉学界熟知。80 年代后，中国学术经历了较大转变，西方汉学再次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重视，汉学著作被大量引进国内，关涉各个学科和研究方向。近些年来，一些西方汉学家甚至在中国刊物上发表论文，直接和中国学者对话。如，美国汉学家倪德卫在中国大陆、台湾出版了多篇有关夏商周三代纪年的中文论文；墨子刻也以中文发表了许多文章，直接参与中西哲学讨论，如 2001 年发表在《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上的“形上思维与历史性的思想规矩——论郁振华的《形上的智慧如何可能？——中国现代哲学的沉思》”。

安乐哲也是和中国学界交流较多的汉学家之一，不过其著作和论文都是经翻译后出版或发表的。他和罗思文《论语》译本的中译本《〈论语〉的哲学诠释》于 2003 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导言和附录成为全书的核心部分，他和郝大维合编著四本有关中国哲学的著作也都已翻译并在国内出版。这几部著作的中西哲学和文化比较方法是中西方哲学对话的一种尝试，为中国本土学者提供了审视中国哲学的新视角，近年来逐渐为国内相关学界关注。安乐哲也频频受邀来中国讲学和访问，交流中西哲学和文化观点，其中包括典籍翻译问题，现在国内学术界也开始出现了一些反响。国内哲学界 (尤其是儒学界) 以及比较文学界对其关注最早，倾向于肯定其成果，如蔡德贵的“试论美国的儒家学派” (2004) 和彭国翔的“全球视域中当代儒学的重构” (2006)，更有硕士论文杨鹤澜的“美国汉学家安乐哲的儒学研究” (2006) 对其学术成果进行了系统介绍。此外，其典籍翻译思想也引起了翻译学界的反响，孙周兴 (2008) 受其哲学翻译思想启发，探讨了欧洲哲学与汉语思想之间翻译转换中的语言限度问题，提出翻译的“差异化原则”；包通法 (2008)

也提倡典籍翻译的“异化创化”策略，实现文化的平等对话。港台学界则批评声音较多，李明辉 (1994) 反对他们认为儒家思想缺乏超越性的看法，香港学者冯耀明 (2008) 认为安乐哲、郝大维对儒学的新诠释是脱离文本的过度诠释，其运用过程本体论和实用主义哲学的诠释方案并不成功，是“对中国 (和儒家) 哲学之误篡化”。

白氏译本并未在国内翻译出版，但由于他们提出的《论语》成书观点新颖、大胆，在国内也有一定的反响，尤其是在史学界和儒学界。该译本在美国出版时，恰逢李泽厚的《论语今读》在国内出版，他在后记中评价了该译本，认为白氏的辨析工作“貌似雄辩，实则证据薄弱，颇嫌武断”，吻合后现代的学术思潮，“彻底解构《论语》，抹去作为中国文化符号之孔子形象” (1998: 461, 462)。李泽厚认为就目前的条件和资源不可能从《论语》篇章中考证、辨析出孔子的言行，重要的是《论语》自汉代张侯《论》以来就以这样的面貌流传至今，这是“无可奈何的历史事实” (同上: 16)。高峰枫在《读书》上发表的文章“《论语》是不是‘孔门福音书’” (2002) 是对白氏译本的综合评价，作者肯定了译本对今后研究者的启发意义，但也指出他们缺乏对经典的“敬意”，建议中国学者研究自己的文化经典要有“敝帚自珍”的关爱态度。杨华 (2001) 受到白氏译本思路的启发，就《孟子》篇章的文本编年给出了考证。也有一些学者完全赞成白氏的观点，如李珺平 (2007) 提倡白氏对待《论语》的“理性视角和客观态度”，批评国内学者传统观点的“民族主义”态度。不过，李珺平过于强调《论语》的史料性，批评国内学者的态度却不够“理性”和“客观”，相比较而言，李泽厚、高峰枫对于白氏的批评较为客观。这些批评对汉学家又提出了挑战，相信会引起更进一步的对话。

安乐哲和白氏由于没有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研究视野较为宽阔，视角和方法都不同于国内研究者，这为中国学界提供了学术创新的思路，可以启发国内学者用新的角度重新审视自己的历史文化，促成了与中国学者的对话。中国学者在对话中不仅肯定其学术价值，也有建设性的批评，这种对话可以改变西方汉学家“自说自话”的研究状况，纠正汉学研究的偏颇之处，进而影响其学术研究思路。正如张西平所说，通过这样的对话，“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将逐步走向自觉和繁荣，也正是在这场对话中汉学家 (中国学家) 才开始面临真正的学术对手，并改变自己的理论形态，也只有在这场对话中中国文化将真正走向世界”。 (2007: 56)

4. 结语

在汉学历史中，《论语》翻译与其他汉学学术

活动一起促成了西方汉学的创立和发展,塑造了不同时期的汉学学术形态。到今天,它又以自己多元的学术形态促使汉学与西方其他学科、与中国学界进行对话和交流,使其朝向新的方向开拓。同时,在这种对话和交流中西方学者对《论语》的理解又得到进一步的深入和丰富,也将会催生新的译本。《论语》翻译就是这样不断为时代推进,在这样的过程中,西方不断重新认识《论语》,认识中国,认识世界,进而认识自身。

* 本文获“《中国翻译》创刊30周年暨出版200期翻译研究有奖征文”二等奖。

注 释

- ① 如彭国翔在文章“从西方儒学研究的新趋向前瞻二十一世纪的儒学”中将美国汉学分50年代、60年代和七八十年代三个阶段,王海龙的文章“美国当代汉学研究综论”也是以十年为一个分期分析了战后美国汉学的研究特点。
- ② 史华慈:“研究中国思想史的一些方法问题”,《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4期(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87年,第59-60页。
- ③ 中译本为《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初版。
- ④ 中译本《通过孔子而思》,何金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 ⑤ 中译本《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施忠连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
- ⑥ 中译本《期望中国:中西哲学文化比较》,施忠连等译,学林出版社,2005年。
- ⑦ 该译本于1979年由企鹅出版社出版,后于1983年由香港中文大学重新修订后出版,就附录和注释做了少许改动,1992年重做修订后再版。
- ⑧ 这里借用了刘笑敢提出的诠释的“两种定向”概念,详见参考文献[19]。
- ⑨ 中译本为《中国变色龙》,北京:时事出版社,1999年。
- ⑩ 目前作者无法获得华兹生的译本,因此略去对该译本的介绍,待之后补充完善。
- ⑪ 以下参照了程钢在其文章“西方学者的先秦思想史研究”中对西方儒学的分类。

参 考 文 献

- [1] 安乐哲.和而不同:比较哲学与中西会通[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 [2] 安乐哲.全球化的本土化与文化遗产——还中国哲学以本来面目[A].汪泓译.乐黛云,李比雄主编.跨文化对话[C].第18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 [3] 安藤彦太郎.日本研究的方法论——为了加强学术交流和互相理解[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
- [4] 包通法.论汉典籍哲学形态身份标识的跨文化传输[J].外语学刊,2008(2).
- [5] 蔡德贵.试论美国的儒家学派[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5):79-85.
- [6] 陈君静.大洋彼岸的回声——美国中国史研究历史考察[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 [7] 程钢.西方学者的先秦思想史研究.见:黄留珠、魏全瑞主编.周秦汉唐文化研究:第1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b:268-285.
- [8] 杜维明.东亚价值与多元现代性[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 [9] 杜维明.儒家传统与文明对话[M].彭国翔编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
- [10] 冯耀明.当代东亚儒学的主要课题与研究进路[A].刘笑敢主编.中国哲学与文化[C].第四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44-268
- [11] 福井文雅.欧美的道教研究[A].道教[C].第三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 [12] 高峰枫.《论语》是不是孔门“福音书”?[J].读书,2002(5):138-145.
- [13] 侯且岸.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4] 黄俊杰.战后美国汉学界的儒家思想研究(1950—1980):研究方法及其问题[A].东亚儒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15] 李珣平.《论语》:孔子弟子博弈之成果——兼谈战国后期儒家八派之争以及荀卿的态度[J].社会科学,2007(10):96-104.
- [16] 李明辉.儒家思想中的内在性与超越性[A].当代儒学之自我转化[C].台北:中国文哲研究所,1994.
- [17] 李泽厚.论语今读[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 [18] 林同奇.“中国中心观”:特点、思潮与内在张力[A].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M].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
- [19] 刘笑敢.从注释到创构:两种定向两个标准——以朱熹《论语集注》为例[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7(2):90-102.
- [20] 刘笑敢.诠释与定向: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之探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 [21] 彭国翔.从西方儒学研究的新趋向前瞻二十一世纪的儒学[J].孔子研究,2000(3):98-104.
- [22] 彭国翔.全球视域中的当代儒学建构[J].中国哲学史,2006(2):35-44.
- [23] 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 [24] 孙周兴.翻译的限度与译者的责任——由安乐哲的汉英翻译经验引发的若干思考[J].中国翻译,2008(2).
- [25] 王海龙.美国当代汉学研究综论[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1):56-63.
- [26] 杨鹤澜.美国汉学家安乐哲的儒学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06.
- [27] 杨华.孟子与齐燕战争——兼论《孟子》相关篇章的文本编年[J].中国哲学史,2001(3).
- [28] 张西平.西方汉学研究导论[A].阎纯德主编.汉学研究[C].第十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
- [29] 周光庆.中国古典解释学导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2.
- [30] Ames, Roger T. and Henry Rosemont, Jr..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A 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M]. New York: The Ballantine Publishing Group, 1998.
- [31] Brooks, E. Bruce and A. Taeko. *The Original Analects: Sayings of Confucius and His Successor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 [32] Cleary, Thomas. *The Essential Confucius: The Heart of Confucius' Teachings in Authentic I Ching Order*[M]. New Jersey: Castle Books, 1992.
- [33] Dawson, Raymond. *Confucius: The Analect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34] De Bary, Wm. Theodore. Introduction [A]. Wm. Theodore de Bary and the Conference o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ese Thought. *The Unfolding of Neo-Confucianism*[C].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5.
- [35] Fairbank, John King. *Chinabound: a fifty-year memoir* [M].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2.
- [36] Fingarette, Herbert. *Confucius—the Secular as Sacred* [M].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1972.
- [37] Hinton, David. *Confucius: The Analects*[M]. Washington, D.C.: Counterpoint, 1998.
- [38] Huang, Chichung.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M].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39] Lau, D.C.. *Confucius: The Analects (Second edition)* [M].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 [40] Levenson, Joseph R.. The Humanistic Disciplines: Will Sinology Do?[J].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3. 4 (1964): 507-512.
- [41] Leys, Simon.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M]. New York and London: W.W. Norton & Company, 1997.
- [42] Lin Tongqi, Henry Rosemont, Jr., Roger T. Ames. Chinese Philosophy: A Philosophical Essay on the "State-of-the-Art" [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4. 3(1995): 727-758.
- [43] Slingerland, Edward. *Confucius: Analects, with Selections from Traditional Commentaries*[M]. Indianapolis and Cambridge, Mass.: Hackett, 2003.
- [44] Watson, Burton.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 [作者简介]王琰, 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在读博士生, 研究方向: 典籍翻译、翻译史
[作者电子信箱]wangyancathy@163.com

《中国翻译》订阅、邮购信息

《中国翻译》为双月刊(单月15号出版), 国际大16开本, 96页, 国内外公开发行,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国内邮发代号: 2-471, 国外邮发代号: BN272。

《中国翻译》近期出版的目录与摘要, 请参看中国译协网站 (www.tac-online.org.cn)

错过征订本刊的读者可通过本刊发行部邮购:

2010年定价: 10元/期, 每册邮资2元, 全年72元; 如需挂号邮寄, 请每期另支付挂号费3元, 全年90元。本刊现库存有以下年份的散本、合订本期刊:

2007、2008、2009年《中国翻译》全年精装合订本, 每册含挂号邮资共计90元;

2009年1—6(10.00元/册)期含挂号邮资共计75元, 单册邮购含挂号邮资15元;

2008年1—4、6期, 含挂号邮资共计65元, 单册邮购含挂号邮资共计15元;

2006年《中国翻译》全年精装合订本, 每册含挂号邮资共计82元;

2007年1—6(10.00元/册)期含挂号邮资共计75元, 单册邮购含挂号邮资15元;

2006年1、3、4、5(8.60元/册)期含挂号邮资共计49.4元, 单册邮购含挂号邮资13.6元;

2005年1、3、4、5、6(8.60元/册)期含挂号邮资共计58元, 单册邮购含挂号邮资13.6元;

2004年1、2、4、5、6(8.60元/册)期含挂号邮资共计58元, 单册邮购含挂号邮资13.6元;

2003年2、3、4、5、6(8.60元/册)期含挂号邮资共计58元, 单册邮购含挂号邮资13.6元;

2002年1、2、4、5、6(8.60元/册)期含挂号邮资共计58元, 单册邮购含挂号邮资13.6元。

2001年1、2、3、4、5、6(5.50元/册)期含挂号邮资共计48元, 单册邮购含挂号邮资10.5元;

2000年1、3、4、5、6(5.50元/册)期含挂号邮资共计40.5元, 单册邮购含挂号邮资10.5元。

1997年: 第5期(4.50元/册), 单册邮购含挂号邮资9.5元; 1996年: 第2期(3.80元/册), 单册邮购含挂号邮资8.8元;

1994年: 第5期(2.35元/册), 单册邮购含挂号邮资7.35元。

《名作精译—〈中国翻译〉英译汉选萃》含挂号邮资共计26元

《名作精译—〈中国翻译〉汉译英选萃》含挂号邮资共计26元

《韩素音青年翻译奖竞赛作品与评析》含挂号邮资共计30元

读者可通过邮局汇款或银行汇款邮购以上刊物和图书:

邮购地址: 北京阜外百万庄大街24号《中国翻译》编辑部, 邮编: 100037

银行汇款: 户名: 中国翻译协会 开户行: 中国工商银行北京百万庄支行 帐号: 0200001409089010159

* 请在邮局汇款单、银行汇款单上写清您的地址、邮政编码, 并在附言处注明刊名、刊期和份数

咨询电话: (010) 68995951; 68995956; 68327209, 电子信箱: taccn2008zhgfybjb@gmail.com

English Abstracts of Major Papers in This Issue

Deverbalization in Conference and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A Cognitive View

by *Xu Ming*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p.5

Abstract: Though a key concept in the “*théorie interprétative de l’interprétation*,” deverbalization has not yet been elaborated precisely by translation scholars. In an effort to shed much-needed light on this often misunderstood term, the present paper subjects deverbalization to a close examination, tracing its conceptual development back to the original sources and reviewing available literature on the issues it has generated. Drawing from what the theories of cognitive psychology and cognitive semantics have to offer in this respect, the author proposes two models for conceptualizing the way semantic organization takes shape in the comprehension processes of simultaneous and consecutive interpretation. An account of how meaning is represented during the deverbalizing process is also given.

Key words: cognitive process; interpretation;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consecutive interpretation; deverbalization; discourse comprehension; cognitive semantics

Pragmatic Inferential Mechanisms Undergirding the Translational Process

by *Chen Kefang*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China) p. 12

Abstract: Synthesizing resources offered by different pragmatic theories, this article proposes a relevance-based model of pragmatic inference and applies it to a reexamination of how culture-loaded words and expressions have been translated. The study lead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poly-systemic framework for better describing the translational process. Within such a framework, it is possible to attack with fresh vigor such recalcitrant issues as to what extent translators should enjoy a subjective status, whether an analysis of the target audience is called for in preparation for translation, or whether having multiple target-language versions of the same source text is justified.

Key words: relevance theory; pragmatic inference; translational process; optimal relevance

Some Principles in the Criticism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by *Wang Guiming*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eijing, China) p. 17

Abstract: Criticism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should avoid basing itself on consideration of surface textual elements only. Rather, the critic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not just the translator’s affective state and poetic conception, but also the historico-cultural milieu in which she functions. An adequate understanding of how and why the target text coincides with and differs from the source text in all applicable terms is a *sine quo non* for conducting the criticism. Besides showing a sensitivity to the cultural context, the critic must also strive to empathize with the translator. For an illustration of what counts as good criticism in this area, the often contentious evaluations of Ezra Pound’s translation are reviewed as a case in point.

Key words: literary translation; criticism; target text; source text; internal factor; external factor

Recent Renditions of *The Analects* and Their Impacts on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 of Sinology in the West

by *Wang Yan* (PLA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Nanjing, China) p. 24

Abstract: Numerous new translations of *The Analects* have appeared since the 1990s, and in both methodological and stylistic terms, these recent renditions differ markedly from the earlier ones. Demonstrating either a theoretical-practical bent or a textual-historical orientation in their interpretation of the source text, and striking for their stylistic diversity

and methodological innovativeness, these new translations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 have been enriching contemporary sinological studies in the West, adding to its current socio-cultural relevancy, intensifying its interactions with neighboring disciplines, and facilitating its dialogue with the Chinese academe as well.

Key words: The Analects; translation; sinology; West; interpretive orientation

A Master Program in Computer Aided Translation

by *Yu Jingsong & Wang Huashu*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p. 38

Abstract: Language services have undergone radical change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is century. In order to meet the demands the new era had placed on translation, the Language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Department in Peking University's School of Software and Microelectronics started in 2007 to offer a Master program in computer aided translation (CAT), which is the first of its kind in Chinese mainland. In this paper, we offer an account of the curricular design of our program following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services. In addition to identifying the problems and difficulties we have encountered in running our CAT courses, we also discuss the CAT students' chance for internship and employment and speculate on the prospects of CAT Master program in general.

Key words: language services; computer-aided translation; CAT; translation technology

Fostering “Attentive Listening Skills”: Strategies for Improving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among Undergraduate Trainee Interpreters

by *Xu Ran*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p.43

Abstract: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is the first and foremost step in the interpreting process, yet for undergraduate C-E trainee interpreters, taking the step is as vital as it is difficult. This paper calls for the fostering of “attentive listening skills”, which enable interpreters to analyze and memorize while listening. Arguing that developing such skills should be the focus of listening training for all undergraduate programs in interpretation, the author elaborates on applicable theoretical insights and practical strategies for this endeavor.

Key words: attentive listening skills; undergraduate programs in interpretation; discourse analysis; training strategy

Guidelines for Translating Captions

by *Han Qingyue*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Beijing, China) & *Xing Binbin*
(Beijing Founder Electronics, Beijing, China) p. 58

Abstract: As a key component of any text with accompanying photos, caption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clarifying the text's meaning and enhancing its rhetorical effects. When rendering captions, the translator should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ir wording and especially to the special perspective such wording introduces on the text as a whole.

Key words: caption; off-screen implication

The Topic-Prominence of Chinese Sentence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E-C Translation

by *Xu Lina*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China) p. 63

Abstract: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typolog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calling attention to the fact that these two languages are dominated syntactically by the subject-predicate and the topic-comment structure respectively. Identifying key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a typical Chinese sentence, the author proposes five approaches for turning a subject-prominent English sentence into a topic-prominent one in Chinese. These methods offer a more convenient way for handling structural adaptation in E-C translation, making it easier to avoid the pitfall of translationese and enabling the Chinese version to sound more idiomatic to its target readers.

Key words: topic-prominent sentence; subject-prominent sentence; structural adaptation